

中国大陆《兰亭序》真伪论辨回顾

陈雅飞

(香港中文大学 艺术系, 香港 新界)

[摘要]《兰亭序》传为王羲之的千古书法名作。宋人开始对传世《兰亭序》是否为右军所作表示怀疑,但因缺乏出土文物的印证而不得深入。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学者对此进行考证,主要立场是否定此帖为王羲之所作。20世纪60年代,南京近郊出土的东晋墓志为《兰亭序》真伪之辨提供新线索,中国大陆学界开始进行比较严肃的学术争论,史称“兰亭论辨”。这场论辨继承了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想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围绕隶书笔意、文字出入、文章风格、智永依托《兰亭序》等焦点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的论辨呈现出一种维护传统、驳论否定论者的走向,学者们不仅考证兰亭真伪,而且把反思的视角投向前期论辨,使学术研究趋于客观冷静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出土的《高崧墓志》为全面认识六朝书法提供实物资料;《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兰亭现象作了综合探讨,真伪之辨日益深入。《兰亭序》真伪是关系到书法史、汉字发展史的问题,意义重大。围绕此帖展开的真伪论辨涉及了社会科学学术探讨的种种层域,对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进行新的探讨,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和独立的学术品格。

[关键词]《兰亭序》;兰亭论辨;中国书法史;王羲之

[中图分类号]J29;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3-0102-09

至少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了《兰亭序》帖真伪之辨的学术争论,其后在清代、民国和文革时期形成了三个高峰,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者观察视角的转换,有关《兰亭序》各方面的研究都在逐步走向深入。在21世纪初回顾20世纪后半期书法界最令人关注的兰亭论辨,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根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对大陆的“兰亭论辨”作一简略的回顾和展望,重温论战双方的主要论点并反思其得失,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导。

一、《兰亭序》真伪之疑的历史回溯

早在宋代就有人对传世《兰亭序》是否为右军所作表示了怀疑。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是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所引何延之《兰亭记》,其中便记载了王羲之对《兰亭序》甚为珍爱,传至七代孙智永,后被萧翼“智赚”而去之事。贞观二十三年,《兰亭》真迹随太宗葬入昭陵。历代多以为此说不可信。当代学者华人德和白谦慎认为:“何氏所记,颇具传奇色彩,其历史可信度值得研究。”^[1] (p.1) 桑世昌的《兰亭考》分类编纂各种相关的笔记、诗文等资料,并作了简短的考订。俞松的《兰亭续考》则收其所见多本《兰亭序》的题记,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代考据学大盛,金石学家翁方纲的《苏米斋兰亭考》代表了《兰亭序》考订的成果。清人赵魏、阮元、李文田、杨守敬等人均对

《兰亭序》持否定论。但此一时期的怀疑因缺乏出土文物的印证而不得深入。

(一) 兰亭真伪之疑的提出(唐宋时期)

清代以前,关于《兰亭序》帖真伪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四大疑点上。

第一《文选》未辑入《兰亭序》。目前所见的《兰亭序》全文,最早见于太宗御撰《晋书·王羲之传》中,但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许槌的《六朝文絜》及王文濡的《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均未见此文。后人对此大为诟议。

第二《兰亭序》帖的流传经过。除何延之《兰亭记》外,关于此帖的流传另有几种不同记载。如刘餗《隋唐嘉话》卷下认为,此帖于武德四年入秦府,《太平广记》卷二〇八引牛肃《纪闻》,认为隋末由广州好事僧得,后为太宗所诈;李冗《独异志》卷中则以为太宗令御史萧翼密购而得^①。但多为小说家言,实不可信。

第三《兰亭序》帖的出现时期。宋代姜夔曾对梁武帝收右军帖 270 余轴,却惟言《黄庭》《乐毅》而不及《兰亭》表示怀疑。另,宋《淳化阁帖》未收《兰亭序》;从宋许开《二王帖目录评释》和目前所能见到的《二王帖》拓本看,旧刻《二王帖》未收此帖;《宣和书谱》记载,宋徽宗内府藏王羲之书籍计 243 种,独未列此帖。这无疑使后人怀疑东晋时期是否出现《兰亭序》。

第四《兰亭序》和《临河序》字数、内容的出入。《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的南朝梁人刘孝标的注文。《兰亭序》与《临河序》文字上有异,主要在于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 167 字,文末亦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 40 字。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略有不同。而唐初纂集的《艺文类聚》卷四“三月三日”项下收录有《兰亭诗序》,基本上与《临河序》接近,也没有自“夫人之相与”以下 200 字。念及《兰亭序》是唐人方见著录,世人难免生疑: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

上述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而真伪难辨。

(二) 兰亭真伪之疑的考证(清代、民国时期)

元明之际,“文选学”衰落,对《兰亭序》“不入选”的问题关注渐少。《兰亭序》的真伪之辨稍有平息。明代项德弘在桑世昌《兰亭考》12 卷辑本的基础上进行校补,并增补了宋代俞松《兰亭续考》2 卷。陶宗仪的《兰亭诸刻考》、胡若思的《兰亭诸本考》以考订为务。及至清代乾嘉年间,随着北碑的大量出土,书家多崇碑抑帖,对流传千余年的二王书法提出怀疑。兰亭真伪论辨遂拉开帷幕。

从现有资料看,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论辨界定为乾隆年间至民国,参与论者为赵魏、阮元、何绍基、赵之谦、李文田、杨守敬、缪荃荪、姚华、姚大荣、张伯英等学者,主要立场为否定《兰亭序》乃右军所作。下面按时间顺序简要介绍几位代表人物的观点。

乾隆年间,赵魏怀疑《兰亭序》帖是“唐人临本”,或是“传摹失真”。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云:“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2〕p.12)

嘉道年间,江宁人甘熙在《白下琐言》卷三中,记载阮元对一晋代残砖字迹的考证。阮元疑其是梁、陈时人所书。甘熙同意此说,并谓“阮公所论,真发前人所未发者”。光绪年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原为汪中收藏)作跋文时,提出“三疑”,并认为“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2〕p.12)。在此文中,他全盘否定了《兰亭序》为真

^① 另可参见武平一《徐氏法书记》、韦述《叙书录》和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相关记载。

迹的说法。李文田此论较具代表性,后为郭沫若接受并发挥。

清代至民国年间,杨守敬、姚大荣、姚华、张伯英等均对此帖的真伪进行了论辨,并一致持否定观点^①。但也有持肯定论者,如欧阳辅在《集古求真续编》和《补正》中,曾斥否定论者“匪夷所思”。他从书体发展的交融嬗递角度指出了书体在各个时代的互存现象,认为“汉人隶书,多杂篆体,六朝真书,多参隶势,盖由递相变更,未能尽改。故隋以前真书,甚有似楷似隶,莫可区别者”。

二、建国以来《兰亭序》真伪的三次论辨

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陆续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郭沫若就其中的《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撰写了两万余言的考据专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刊于《光明日报》1965年6月7日和《文物》1965年第6期),引起学界的强烈震动。高二适认为“郭氏所论‘惊心动魄’;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3]p.4。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法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4]p.1919。《兰亭论辨》正式开始。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兰亭论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965年到1973年为第一阶段,本阶段充分利用出土文物,参与者多为国内著名文史专家;“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论辨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的论辨在对古人成果的继承和研究方法的拓展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高的起点。1976年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为第二阶段。此间,兰亭论辨呈现出一种维护传统、驳议否定论者的走向。学者们不仅考证兰亭真伪,而且把反思的视角投向20世纪六七年代的论辨,使学术研究趋于客观冷静的分析,不再盲从权威。20世纪90年代初迄今为第三阶段。1998年在南京市东郊出土的《高崧墓志》,为全面认识六朝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并为《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考订提供了新线索。

(一) 当代《兰亭序》帖真伪论辨的肇端(1965—1973)

1958年至1965年在南京出土的谢鲲和王兴之、宋和之夫妇等系列东晋墓志铭,书法古朴,与“二爨”相近,成为怀疑传世《兰亭》书迹非真的新实证,以郭沫若撰文考据为先声,兰亭论辨拉开帷幕。此一时期论辨的参与者多为国内文史专家,持否定论者有郭沫若、宗白华、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但阵营内部颇有分歧。持肯定论者有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唐风等。由于受到政治时局和社会思潮的干扰,反驳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不多,且舆论普遍支持否定论者,对高二适等人的驳议不予登载。此一论辨时间界定为1965年6月(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之文发表)至1977年10月(文物出版社集辑出版《兰亭论辨》)。特点为双方都重实物考证,重古籍钩沉,持论甚严,多配以插图佐证;一部分学者敢于挑战权威,探讨学术;由于时局影响,学术受到政治干扰,未能进一步深入。

下面笔者拟围绕几个焦点问题,就《兰亭论辨》所辑的18篇文章,回顾论辨双方的观点^②。

第一,关于东晋书法“隶书笔意”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晋和南北朝砖石刻片和经卷、书牋等文物的相继出土,为论辨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持,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充分利用了新出土文

① 1865年,杨守敬在《楷法溯源》凡例中指出:“隶书以徒隶得名,故楷书亦称隶书,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在魏晋之间……集帖所载钟、王楷书,皆唐以后抚拓,无分隶遗意,不足为据。”1911年,姚大荣在自印的《惜道味斋集》中,列举了有关《兰亭序》的自相矛盾处,斥之为“十七妄”。1916年,姚华在《广武将军张产碑跋》中叙述了碑的发现、流传和遗失,对翁方纲的“毕生俯首惟《兰亭》”作了讥讽。1924年,张伯英在《宝颜室书跋》中指出:“今隶起于汉魏之间,而魏晋碑碣,纯为分书法帖,钟、王楷则难可凭信。正书鼻祖当属此碑。”《兰亭》体势平近,殆唐人书。将《兰亭序》帖的下限又一次推到了唐代。

② 此一部分所引观点除特别注明外,均见于《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第1版。

物。一方面 郭沫若认为《兰亭序》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以为“东晋时期的书法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龙潜认为“由篆生隶，隶生章草，到齐梁年间才逐渐产生正书”；于硕认为“楷书始于隋唐”；李长路根据东晋永和年间所作的《李柏文书》饶有“隶意”，判断《兰亭序》新体书风不可能在东晋出现。另一方面，高二适引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颖川“钟繇”条关于“钟书有三体（铭石、章程、行押），以及元人郑杓《衍极》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等，认为“今梁、陈闲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3〕p.18）商承祚认为“不带有隶书笔意的行、草、楷”在东晋是可能的，并具体论证了王羲之的书法风格，以为王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书，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结合的行书”（〔5〕p.19）。他根据《唐六典》“五体书”说明唐代仍沿晋称楷为“隶”，称汉隶为“八分”，故不同意有人把“隶书笔意”的概念不恰当地扩大①。

第二，关于《临河序》和《兰亭序》文字出入的问题。一方面，否定论者进一步否定《兰亭序》为真迹。启功以所见八大山人《临河序》帖仅有几字和今本《世说注》不同，认为此为右军原作。李长路认为：“《兰亭序》绝非王羲之作，而《临河序》乃是王羲之地地道道的原作无疑。”（〔6〕p.97）另一方面，肯定论者认为《世说新语》注对《兰亭序》原文作了删改，不足为据。高二适根据《世说新语》中戴渊少时游侠条“刘注”引陆机荐赵王伦笺，与《陆机本集》所载此笺比较，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因此推断“刘注”所引《临河序》之文字，当是由《兰亭集序》原文删节而来的。商承祚支持高氏的观点②。

第三，关于《兰亭序》文章风格问题。否定方观点如下：郭沫若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鯁称’”；“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2〕p.14）。李长路认为《临河序》的格调才真正和魏晋时代风格及社会思想吻合，羲之不可能作悲观之词。肯定方观点如下：章士钊认为，谢安《兰亭诗》中“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对应王羲之当时“齐彭殇为妄作”一语，可见《兰亭序》确系原作。商承祚认为“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且伤怀悲感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情绪，不足为怪。

第四，关于智永依托《兰亭序》的问题。这一观点在否定方阵营中有内部分歧。郭氏认为“现存《神龙本兰亭》墨迹”就是兰亭序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他进一步认为：“……他（智永）也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2〕p.17）龙潜、赵万里和史树青同意郭氏的依托说，但未指名“智永”；启功认为一些细节有待考证，不可断言；李长路认为伪帖是仿智永手笔。肯定方则认为“依托”说并无实据，以商承祚、章士钊③的观点为代表，另有一部分文章亦可供参考④。在此不复赘引。

① 香港的黄君实通过考证，认为晋代“王羲之传”善隶书，为古今之冠“之隶书，即今世所传《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像赞》等小楷书，固无疑义矣”。并进一步认为“梁时正书，已与唐楷无殊”（黄君实《崇基学报》第5卷，1965年第1期）。黄的文章虽然已经不属于本文回顾的范畴，但有一定价值，在此附注以备读者申发。

② 黄君实认为：“《临河序》正为刘孝标或其所据本所命之别号，非羲之自定者也。”“‘至’字稍有殊者，或为刘所据本不同，或为传刻之误，则无能考之矣。”由此认为《兰亭序》是《临河序》的原本（黄君实《崇基学报》第5卷，1965年第1期）。

③ 197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书中有一篇《柳子厚之于兰亭》的文章，提及柳子厚承认《兰亭集序》文章和帖都是出于王羲之之手。章士钊认为“兰亭使转，每每含有隶意”，进而指斥清代李文田“习有偏嗜，因而持论诡譎”，认为如果依照李文田的说法，“诚不知中国书法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文章虽未点名，但全面驳斥郭氏观点的立场却十分明了。

④ 参见伯炎甫《兰亭辨伪一得》《文物》1965年第12期；张德钧《兰亭序依托说的补充论辨》《学术月刊》1965年第11期；许伯建旧稿《王谢墓志不足证兰亭帖出于伪托》，原稿写于1965年9月23日，因故未刊，后载于《重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唐风《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文汇报》1965年8月19日。

这一时期的论辨,持肯定论者当时能公开发表的文章为数寥寥^①。1977年出版的《兰亭论辨》一书,共收录郭沫若等否定论者自1965年至1973年的论文15篇,另选用高二适等肯定论者的论文3篇,这无疑有益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但其出版说明里明显地流露了偏袒郭沫若一方的倾向,不利于正确客观地评价学术争鸣^②。

(二)《兰亭序》真伪论辨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

文革结束后,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各种思潮的激荡使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趋向多维与成熟,兰亭论辨再起高潮。这一时期参与的论者有侯镜昶、丁灏、喻蘅、张昕若、周传儒、黄仁轲、庾人俊、马里干、刘开杨、刘家相、王琰、应成一、许庄叔、唐兰、李长路、王玉池等,多学科和多视角的综合交织,使论辨向纵深发展,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论辨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兰亭序》为右军所作,此观点占了上风,否定论者已屈指可数。这一时期围绕此帖真伪进行讨论的文章相当多,仅笔者手头所收的就有近五十篇。以下择其精要,略作回顾。

南京大学教授侯镜昶结合出土书迹和东晋墓志,认为“东晋时已有不带隶意的真行书出现”,“王羲之是改革旧书风、创造新体真行的代表人物”(侯镜昶《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喻蘅引用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安碑林发现的南宋整拓《圣教序》,驳议20世纪60年代的否定论者以“大量字迹集中摩自《兰亭序》构成《圣教序》的基本框架”为论据,认为《兰亭序》应是真迹(喻蘅《从怀仁集圣教序试析兰亭序之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周绍良撰长文否定李文田之“三疑”,根据史料,就王羲之时代的书体源流和哲学思潮一一进行了探索,并就“内证、外证、旁证”三方面肯定了《兰亭序》的真实性(周绍良《兰亭序真伪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周传儒就真伪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辨析与考证,提出并论述了《兰亭序》从文到字均出自王羲之手的本证和旁证,由此兼及北碑南帖的发展源流,进一步表明了对今后书法发展方向的看法(周传儒《论兰亭序的真实性兼及书法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朱铸禹遗作则从王羲之性格分析智永伪造说,从两方面来驳议郭沫若的观点(朱铸禹《兰亭序再议》《南开学报》1981年第3期)。翁薰、庾人俊、马里干等人分别在《书法研究》上撰文(翁薰《兰亭序之管见》,庾人俊《关于晋朝的书体问题》,马里干《晋代书体与兰亭序帖》均载于《书法研究》1982年第1期),阐释所谓王羲之“工草隶”“尤善隶书”,即是工今行草和楷书,肯定《兰亭序》的产生是魏晋书法在历史性大变革下的必然结果。也有一部分文章论述的是《兰亭序》的思想和文风^③,体现了研究视角的转换。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对有关《兰亭序》的争论作了认真的检讨,所论包括如下几点:对史籍中的隶书、楷书等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界定,认为《兰亭序》的后半段与王羲之典型个性、生活背景和思想相符,驳斥李文田的无根之谈,指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对《兰亭序》的再肯定。徐复观在文末指出:“求真”是构成学术尊严的重要条件,而学术尊严也是构成一个国家民族尊严的一部分。[7] p.161)另外,逯钦立认为:“世传《兰亭序》不是王羲之写的,而是他六世孙智永搨缀、临摹的”。作者指出:“世传《兰亭序》或者说《晋书》王传的兰亭宴集序文,符合王羲之的思想

① 如高二适写于1972年10月的《兰亭序伪之再驳议》一文,延至1982年1月才得以在《书法研究》上公开发表。

② 《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第1版。编者在“出版说明”里指出:“郭沫若同志的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报刊上发表了不文章,多数文章赞同郭沫若同志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观点;兰亭‘真伪’之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断言:“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③ 参见陆家桂《略谈兰亭集序的思想和文风》《齐鲁学刊》1984年第6期;姚学贤《兰亭帖的书法艺术特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李炳海《兰亭序文学价值新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和生活情况,是王羲之的文章,不是后人假造的,后人也是假造不出来的。〔8〕(p.181)李长路仍坚持认为“六朝是八分书演变的过渡时代”。他的结论是“序帖不是王羲之所作,而是他的六七代后嗣所为,而今天所传下来的各种《兰亭帖》,又是唐宋以来的摹本和伪作,更是‘伪中之伪’的赝品。〔9〕(p.14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论辨不仅限于对《兰亭序》进行真伪的考证,而且开始反省前期论辨中的得失,上述文章即是一例。王玉池在文中通过冷静分析,指出了文革前论辨双方中存在的误会以及学术探讨中的方法问题(王玉池《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他》,《中国书法》1988年第3期)。

(三)《兰亭序》真伪论辨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迄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兰亭论辨已趋于冷静,书法理论界聚焦于新兴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学学科的建立,不再纠缠于兰亭帖本身的真伪问题。但仍有一部分文章有相当的水准,如沙孟海从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和刻体的差异、王玉池从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清水凯夫从《兰亭序》不入《文选》的原因、卞孝萱就《兰亭序》墨迹从佛寺到宫廷的流传过程,各自为《兰亭序》真伪的进一步论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些有关兰亭真伪论辨的综述文章,其中以喻蘅和毛万宝的文章(喻蘅《兰亭序论战廿五年综析与辨思》,《复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毛万宝《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书法研究》1994年第4期)为代表,两文总结前人成果,反思得失,对书法研究的梳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真伪论证的冷静思考作了必要的回溯。

兰亭论辨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为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考订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其中二号墓室前部出土有两方极为珍贵的砖质墓志,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墓墓主为东晋侍中、建昌伯、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1999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六朝家族墓地考古有重大收获》的报道。

根据有关专家论证,《高崧墓志》是目前南京市博物馆乃至整个南京及周边地区收藏的六朝墓志中楷书最早、刻功最好的一方,它为研究中国楷书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我国书法史上,魏晋时期正处于由隶进入楷的转折阶段。两处墓地(另一处为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墓志,隶书体带楷意,是六朝书法中之精品,为全面认识六朝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并为王羲之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考定提供了新线索。由于高崧与王羲之为同时代人,因此,《高崧墓志》的出土,又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资料。但它是否可以证明《兰亭序》帖的真实性,有待当代学者的严肃考证和进一步探讨。如王玉池在1999年“《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谈到《高崧墓志》,认为这块墓志是否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楷书遗迹”值得存疑,指出报道对郭老的论点多有误会,最后认为《高崧墓志》的出土不可能为兰亭论辨画上句号〔10〕(p.279)。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6月17日至19日,在由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和沧浪书社联合举办的“《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对兰亭现象作了综合的探讨^②,2000年结集出版的《兰亭论集》上编“补充《兰亭论辨》,收录的是重要论文”;下编“收录研讨会论文,集后附有《兰亭序》研究论著索引,为新时期《兰亭序》研究集大成者。其中有一定篇幅论及真伪问题,略述如下。

从文俊的《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从史料的解析入手,考证了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书风的真实状态,并对魏晋出土文字的性质和学术意义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在回顾

① 沙孟海《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新美术(浙江美术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王玉池《王羲之与道教和兰亭序文章问题》,《中国书法》1993年第4期;清水凯夫《王羲之兰亭序不入选问题的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卞孝萱《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

② 关于此会的缘起意义及与会情况的简述,可参见华人德、白谦慎主编的《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序”。

“‘兰亭论辨’所见错误举例分析’的基础上,从世传《兰亭》摹刻本、文字出入及流传情况三方面,提出了对《兰亭》伪托说的疑问,认为‘现有资料还不足以证明《兰亭》必伪’〔11〕(p.255)。王玉池在《有关‘兰亭论辨’二题》的第二部分‘《兰亭序帖》能否代表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中,列举了李长路、张昕若、朱关田、侯开嘉、徐利明、熊秉明等诸位名家关于对《兰亭序》为羲之真迹持保留态度的观点,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对兰亭论辨作结论的时候〔10〕(p.281)。刘涛在《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一文中,从“东晋立碑设志的风气”、“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类型”、“东晋铭刻书迹中存在的‘变态现象’”、“东晋‘方笔隶书’的流变与渊源”及“由‘北碑’和‘南帖’看东晋的铭刻书法”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东晋的铭刻书法还处在“隶书时代”。作者由此谨慎地得出结论:“当我们结合南朝碑志以楷书为大宗的情况来考察这一变化时,似乎可以说,铭刻碑志的主流书体由隶书向楷书的转换,不会晚于东晋时期。那么,东晋的铭刻书法,准确地说,是处于隶书时代的尾声。”〔11〕(p.307)这些论述间接地为判断《兰亭序》真伪提供了新的论据^①。莫家良先生则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南宋对魏晋书风的承续,虽未直接介入真伪的判断,但论述之详尽,引人深省〔12〕(p.393)。

三、兰亭论辨的意义及对当今书坛的启示

兰亭论辨,不仅仅是对某件书法作品的真伪鉴定,而且是关系到书法史、汉字发展史的重大问题,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否定论者所谓东晋时代书法仍停留在“隶书笔意”阶段的论点如果成立,必然彻底否定晋代书风革新,从而使中国书法史倒退三百年。因此,关于《兰亭序》论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毛万宝在《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透视》中提出了《兰亭序》论辨的五条意义,其内容为:有助于了解书圣王羲之本人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有助于了解东晋书法史的基本面貌;有助于了解东晋前后文字演变的情形、规律及其原因;有助于了解东晋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基本风貌^②。笔者在此基础上再补充三点。

其一,兰亭论辨继承了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想和清代乾嘉学派严谨治学的传统,对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进行新的探讨,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和独立的学术品格。其二,兰亭论辨中充分利用文物资料,重视考证,体现了对原始文献资料和新出土文物的敏感性。其三,论证方法的多样化——除主体用考据学之外,同时注重调动文字学、编辑学、历史学和版本学等知识,另有关于比较学、统计学和文化学等新学科原理的积极使用;论证视点的多元化——不仅涉及书家论、书体论、书风论、书派论,同时把关注点投向考古中的碑、帖、简、牍、器铭等文物资料。

但回顾兰亭论辨,我们会发现,其中不少论家的论证角度、思维方式等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在1965—1973年的论辨中尤为明显。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所言:“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君子能同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反思得失,有些启示值得书学理论界参考:

(1) 学术研究不能迷信权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论辨中,个别专家缺乏谦逊谨慎的雅量,论证多有意气之说,一部分论者则盲从权威,加上后来政治因素的干扰,使论辨未能进一步深入。

^①《光明日报》在1998年12月4日的“史林版”中,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作者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因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②对此,笔者以为毛万宝的用辞略显夸张。他认为:“如果《兰亭序》文章并非王羲之所作,那东晋思想史恐怕会呈现另外一种全新的情形……则东晋文学史的基本风貌必将与《兰亭序》之文迥然有异。”这样的说法,似较为武断而轻率。

(2)学术讨论引用资料需严密校勘考释。如李文田的“三疑”历来为否定论者奉为准绳,但“三疑”说只是李氏鉴赏书画时的题跋,不能排除高标自树以炫其识的可能性。

(3)学术辩论需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对方论点,抓住要害严密求证,以理服人,切忌误解^①。

(4)学术考证要求对症下药。兰亭论辨中,人们普遍采用了一种以碑证帖的方法,这种以出土砖石文字的字体来评说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帖书的真伪,是缺乏科学性的^②。

(5)要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物,这是文献考证的基本手段。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的开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新材料及其支撑它们的考古学给书法史在对象、方法和观念上都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并由此给后者带来了转变和新的发展机会,这是值得书法研究者注意的。

(6)书法研究中要注重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和史学史等学科的交叉运用,同时要注重文字学、版本目录学、比较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知识的全面掌握,这样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切不可偏于一隅,坐井观天。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与华康德(L. Wacquant)所著的《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指出:“对于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具有独立性或自主性的判准,要根据它的科学研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13] p.56。兰亭真伪的论辨涉及了社会科学学术探讨的种种层域,在反思论争得失的当下,布迪厄的论点尤其具有警醒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序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1-3.
- [2] 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A].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辨:上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5-32.
- [3] 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A].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辨:下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4-10.
- [4] 章士钊.柳文指贗[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5] 高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A].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辨:下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11-25.
- [6] 李长路.《兰亭序帖》辨妄举例[A].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辨:上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94-107.
- [7] 徐复观.《兰亭序》争论的检讨[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145-161.
- [8] 逯钦立.《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128-132.
- [9] 李长路.略论王羲之的思想与书风[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142-144.
- [10] 王玉池.有关“兰亭论辨”二题[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279-283.
- [11] 丛文俊.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230-259.
- [12] 刘涛.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A].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298-309.

① 关于这一点,王玉池在《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他》中,论及了“如何理解李文田的两句话”、“郭沫若并未否定王羲之的地位”、“郭沫若、商承祚、赵魏对王羲之的一些作品的看法基本一致”,澄清了“兰亭论辨”中的一些误解。

② 魏晋时代,我国南方一般盛行简牍帖书,文人士大夫们并不提倡碑刻,而北方盛行碑版,故而简牍罕传。从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看,书法是作为一种标榜门风与保持家庭文化优势的艺术,是一种十分高雅的艺术追求。尤其南方的士人们更注重尺牍书法,而对碑石书法持漠视的态度。

- [13] 莫家良.《兰亭序》与宋高宗——南宋古典书风的复兴[A]. 华人德,白谦慎.兰亭论集[C]. 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393-405.
- [14] P. Bourdieu,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A Review of the Authenticity Debate over the Calligraphy Model of 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in China's Mainland

CHEN Ya-fei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 T.,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 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Lanting Preface for short) is a time-honored masterpiece of calligraphy by Wang Xizhi (303-361). Since the Song Dynasty, debates have been going on among scholars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calligraphic work, which reached the peak three tim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Song Dynasty, questions were raised concerning the attribution of the Lanting Preface to Wang Xizhi as well a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ork itself, but the studies were restricted by lack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dow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scholars made textual research, with the attempt to prove that the Lanting Preface was not the calligraphy by Wang Xizhi.

The Eastern Jin epitaph unearthed near Nanjing around 1956 provided new information for the issue of the Lanting Preface, arousing heated debates among the scholars in China's mainland. The debates over the Lanting Preface since the 1960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ent from 1965 to 1973, during which scholars, mostly expert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made an academic breakthrough. Carrying on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develope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at of the Qian-Jia School, these scholars made full use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o discuss issues such as the writing manner, texts, literary style and Zhiyong's forging of the Lanting Preface. The second stage ran from 1976 to the 1980s, with scholars inclined to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status of Lanting Preface from the negative attitude by stud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alligraphic work and reviewing the debate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in an objective and analytical manner. The third stage was resumed from the 1990s to present. Thanks to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 of Gao Song which served as an additional referenc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x Dynasties calligraph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Lanting Preface", closer pursuit has been followed in the study of the authenticity of Wang's calligraphic work.

The authenticity of Lanting Preface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e related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have covered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stimulated the revision of old conclusions, thus demonstrating the openness and independence of scholarly studies. To review such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s indee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is new millennium.

Key words : 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Lanting Preface); authenticity debates over the model calligraphy of Lanting Prefac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Wang Xizhi; authenticity